

# 福音書文本生產的動態分析\*

## 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of Gospel Texts

侯春林

HOU Chunlin

### 作者簡介

侯春林，河南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HOU Chunl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Email: houchunlin2012@163.com

## Abstract

The Gospel was never a ready-made text, but was formed through an extremely complex, dynamic process, with stages of writing, canonization, copying and revising. In light of the western Marxist theory of Textual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Gospel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 of production mechanism: manual duplication and mechanical duplic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whether by manual reproduction or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he Gospel has been adulterated with a variety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xt generation, and subtle changes in the text have exerted a particular ideological effect in history. The confront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led to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eological disputes, which were importan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shaping of early Christianity, and are vividly seen in the early dynamic formation of the Gospel texts.

**Keywords:** Gospel, text production theory, ideology, canonization,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text

聖經有一個動態的生成過程，對文本生產過程的探究應當是聖經闡釋的首要環節，能夠直接發掘出意識形態在聖經文本生產過程中的滲透，從而有效地減免各種後來因素對文本含義的干擾和侵蝕。下面首先對文本生產理論的適用性進行論證，然後借助這一理論工具揭示福音書文本的動態生成機制。

## 一、文本生產理論對福音書文本的適用性論證

“生產”本是一個經濟學概念，由於經濟基礎決定作用的邏輯鏈條，使得精神文化亦被認為具有生產的屬性，從而“文化生產”成為馬克思進行上層建築批判的重要武器。“文化生產”具有的生長性和開放性意涵為福音書文本闡釋提供了巨大空間。

### 1. 生產性是藝術創作的先天特徵

文學生產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而從生產的角度對藝術進行清晰界定的是馬克思，他提到：“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種特殊方式，並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sup>①</sup>從馬克思對文學生產的敘述來看，文學生產同物質生產一樣，並非商業社會和市場經濟的特有產物，而是在人類文明早期便已存在。<sup>②</sup>

---

\*本文是中國博士後第66批資助項目“聖經經濟思想及其作用機制研究”、河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培育計劃資助項目（2019CXTD006）、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7CZX020）的階段性成果。[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following funds: The 66th Post-doctoral Research Fund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Ideas in the Bible and Its Mechan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Team Cultivation Program of Henan University (Project No.: 2019CXTD006);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of Henan Province (Project No: 2017CZX020).]

<sup>①</sup>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7頁。[Karl Marx,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267.]

<sup>②</sup>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7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13頁。[Karl Marx, “In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x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113.]

即便古代和現代的社會狀況發生了巨大改變，但最基本的文學生產機制依然是相通的——都表述了意義生成機制所具有的社會效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生產理論分別從政治經濟學、哲學兩個層面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的藝術生產理論，前者以本雅明、布萊希特為代表，後者以阿爾都塞、馬歇雷、伊格爾頓為代表。其中，從哲學層面繼承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並進行範式轉換的代表是馬歇雷和伊格爾頓。馬歇雷提出文學以意識形態為原料進行生產，而文學和意識形態之間呈現為一種“離心”結構，這種結構使得文學文本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具有諸多的“症候”。在馬歇雷看來，“意識形態以其意味深長的沉默、巨大的空隙和形式出現在文本中”<sup>①</sup>。意識形態在文本中造成的“症候”是作者的“無意識”行為，是作者受其所處社會位置的意識形態局限造成的結果，作者本人實際上無法意識到自身的意識形態策略。

伊格爾頓繼承了馬歇雷關於文學與意識形態關係的看法，並提出“美學意識形態”的概念。據其所論，美學意識形態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的美學”，只是裹上了美學“外衣”（形式）的意識形態。易言之，美學是為意識形態而服務的，伊格爾頓真正尋求的是一種“形式的政治”。據此看來，伊格爾頓的文學生產理論依然沒有逃逸出唯物史觀“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理論架構，且他試圖解決的仍是庸俗馬克思主義或機械反映論的老問題，他從審美出發又回到審美，目的並非挖掘文本中的意識形態衝突，而是要探尋現實衝突在文本中的消解。

## 2. 福音書文本的動態生成過程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邏輯核心在於，統治階級的意志以一般的社會形式表現出來，而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則是確認了意識形態的歷史無意識性。<sup>②</sup>不過，意識形態既可能是一種“政治無意

<sup>①</sup> 伊格爾頓：《馬歇雷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戴侃譯，載《國外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第37頁。[Terry Eagleton, “Macherey an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rans. DAI Kan, *Social Sciences Abroad*, no. 1(1983): 37.]

<sup>②</sup> 張一兵：《問題式、症候閱讀與意識形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第144頁。[ZHANG Yibing, *Wen ti shi, zheng hou yue du yu yi shi xing ta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 2003), 144.]

識”，也不能完全排除“政治有意識”的可能性。進一步講，政治可能是無意識的，但作者的政治意識必然是有意識的。正如馬歇雷所說：“為了說出一些事情，必須隱藏另一些事情。”<sup>①</sup>而無論是“說出”還是“隱藏”，都並不必然排斥作者意識形態的在場。

就意識形態的社會功能而言，筆者認為，意識形態是用以凝聚和延續某一社會共同體的思想工具，通常表現為“圖標”“象徵符號”“口號標語”等外在傳播形式，亦有以口傳或書面文本形式流傳的一整套敘事內容，其中包括共同體建立過程中的重要人物與重要事件；意識形態既有針對共同體內部和針對其他共同體的空間維度，也有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維度；當共同體遭到危機時，意識形態能夠極大地提高共同體成員的向心力，當危機過於嚴重時，個別成員亦有可能在既有意識形態傳統中闡釋出新的意識形態內容，甚至分化和衍生出新的共同體；新共同體與原共同體在共享意識形態傳統的同時，勢必醞釀並形成另一套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由此觀之，福音書的生成過程也是意識形態發揮社會功能的過程。對於福音書的生產來說，需要區分文本寫作過程、正典化過程、傳抄修訂過程，這三個過程都具有生產性。文本的生產過程是出於有意識的集體運作，其中涉及多個利益群體和複雜環節，形成了獨特的文本生產機制：包括生產者（包括福音書作者、抄寫者、編者、譯者）、生產技術（從手工複製到機械複製）、傳播方式（從口頭傳播到書面傳播）、消費者（識字程度不等的受眾）等各項必要因素。

在福音書中，歷史性和意識形態性是兼而有之的。福音書寫作的初衷更多地是對口述時期耶穌言行的記錄，最早成書的《馬可福音》其實是對一堆現成素材的整理和匯編，其歷史性大於意識形態性。然而，隨着福音書文本的動態變化，其意識形態性逐漸佔據上風。福音書從一開始就與紀元初期的社會現實密不可分，而且四部福音書無一例外都經

<sup>①</sup> 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95.

歷了傳抄和修改的過程，這一過程與消費社會中的文學生產機制有着異曲同工之處。確切地說，福音書文本生產過程對文本的改動很大程度上是各種意識形態因素（神學、性別、異教徒和猶太人等）互相博弈的結果。<sup>①</sup>《馬可福音》及之後其他幾部福音書摻雜入了作者各具特色的意識形態因素，並形成了四福音書內部特有的“間性”現象。<sup>②</sup>

對福音書文本生產的考察，不僅應當關注基本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狀況，還應當將不可控的外力因素、初期教會的人員構成、耶穌運動的人性魅力對群眾社會心理的吸引（“卡里斯瑪”）等多種因素都考慮在內。此外，還有必要區分耶穌、福音書作者、抄寫員、教會領袖等不同主體在文本生產中承擔的不同職能。筆者認為，福音書生產者試圖通過文本來消解性別、種族、階級等邊緣化群體的社會矛盾，並在各種神學論爭中凸顯耶穌的神性與人性、文本的神聖性與世俗性之間關係的復調本質，<sup>③</sup>為從文本生產的角度研究福音書提供了合理性和闡釋空間。隨着早期教會處世策略的調整，對福音書進行屬靈化處理以消解社會衝突的趨勢逐漸明朗。福音書對於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大瘟疫、耶路撒冷覆滅等事件的表述或是空白、或是曖昧不清，對耶穌的傳道和事蹟則多採用隱喻和超自然的敘述方式，而相比之下對於神性主題的抒發卻重彩濃墨。從《馬可福音》到《約翰福音》，隨着時間的推進，世俗性逐漸淡化，神性色彩逐漸濃重。

對於此類文本現象，馬克思主義聖經學者貝羅（Fernando Belo）的看法不無道理：在羅馬帝國的高壓統治下，早期基督教會面臨嚴峻的

---

<sup>①</sup> 參見伊格爾頓：《耶穌基督：福音書導論》，趙文瓊譯，載《基督教文化學刊》，2010年春，第77頁。[Terry Eagleton, “Introduction to Jesus Christ: The Gospels,” trans. ZHAO Wenqio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23(2010):77.]

<sup>②</sup> Fernando Belo, *A Materialist Reading of the Gospel of Mark*,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Maryknoll: Orbis, 1981), 67.

<sup>③</sup> 有關耶穌形象以及聖經文本複調性的討論，可參Walter L. Reed, *Dialogues of the Wor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Bakh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④</sup> *Ibid.*, 32-33.

生存危機，將自身進行屬靈化解釋未必不是一種明哲保身的策略。<sup>①</sup>但是，事實證明這一策略並不足夠成功，因為神性和人性之間的張力與衝突在文本中經常會給作為接受者的會眾造成“閱讀阻礙”。福音書闡釋的任務正是透過歷史的煙塵，對文本的原初含義進行盡可能接近真實的還原，其目的並非還原歷史，而是有益於詮釋歷史。一如埃爾曼（Bart D. Ehrman）所說：“追溯蓄意修改的部分可謂關係重大，並不是因為這能保證我們了解到原始作者想說什麼，而是可以呈現作者的文本經過抄寫者的複製可以詮釋出什麼。”<sup>②</sup>

### 3. 福音書文本有效規避了文學生產理論的固有缺陷

文學不僅是一種審美形式，還具有不可言說的內在詩性。文學生產理論是把利刃，但詩性因素的存在恰恰能夠輕易地將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不過，福音書文本剛好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這一問題。整體來說，聖經中的意識形態因素相對於詩性因素是佔上風的，原因在於，福音書作者無意借聖經來表達個人審美，他們敘述的主題皆是國家大計、生民疾苦，當然更重要的是神人之際。再加上福音書還有一個動態生產的過程，意識形態因素最大限度地壓縮或利用了其中的詩性因素<sup>③</sup>，從而清理出了一個意識形態鬥爭的文本戰場。

除此之外，作者問題和生產流程問題是文學生產理論存在的兩個缺陷。作者的主體性、神秘性在伊格爾頓和馬歇雷那裡被貶低為一個符號，變成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甚至作者本身竟淪為“被放逐的主體”。與之相比，作品的地位被大大提高：“實際上是作品在生產自

<sup>①</sup> Fernando Belo, *A Materialist Reading of the Gospel of Mark*,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Maryknoll: Orbis, 1981), 83.

<sup>②</sup> 巴特·埃爾曼：《錯引耶穌：〈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黃恩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153頁。[Bart D. Ehrman, *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trans. HUANG Enl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153.]

<sup>③</sup> 意識形態既可能壓縮純粹審美的詩性因素，又可能利用詩性的媒介進行傳達，甚至“意識形態會作用於敘事使之為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服務，從而使得敘事本身再次被意識形態化。”參見Tina Pippin, “Ideology,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Bible,” *Currents in Research*, no. 4 (1996): 63。

己”，而“批評的職能在於發現每部作品中這種自我生產的規律。”<sup>①</sup>

不過，對於福音書來說，其作者恰恰連“被放逐”都不需要，而是本來便以符號狀態存在着，從一開始便喪失了作為作者的主體權利。直到18、19世紀的來源批評和編修批評者那裡，福音書的“作者身份”才引起真正重視。<sup>②</sup>可以推測，目前我們看到的福音書最初可能經歷了複雜的文本生成過程，其中蘊含了口傳時期的民間素材和傳聞故事，文本之內還存留着生產者加工改造的痕跡，但通常意義上的作者身份早已湮沒無聞了。在成書之後，福音書作者的位置顯得更加不重要：“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都是歷史人物，但我們不知道這些人所寫的本文哪些是與他們有關聯的。總的來說，他們的所為是含糊可疑的。”<sup>③</sup>據學者考證，福音書的“四源”不僅與當時幾個大教會直接相關，而且還是福音書正典化過程中的主要原因。<sup>④</sup>確切地說，那些進入正典視野的材料第一目的即滿足當時教會及信徒的信仰生活，在此意義上，來源批評和編修批評所做的努力或許終將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偉業”。

當然，說整個福音書生成過程完全是意識形態化的並不符合實際，筆者亦無此意。譬如說在福音書正典化過程中，一方面，教會大會在樹立正典福音書標準方面確實有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需考慮到那些正典在教會大會之前實際上已經被當作權威性經典在使用。啟蒙之後，理性主義和懷疑主義引發的福音書拆解分析使之不再僅是神聖啟示的符號，也具有了歷史性，<sup>⑤</sup>因而成為開啟近現代聖經學研究的重要關口，居功至偉。本文所圖，無非是想借由意識形態批

<sup>①</sup> 伊格爾頓：《馬歇雷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第37頁。

<sup>②</sup> Steven L. McKenzie and Stephen R. Haynes, eds., *To Each its Own Meaning*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 35-37.

<sup>③</sup> 伊格爾頓：《耶穌基督：福音書導論》，第77頁

<sup>④</sup> 《馬可福音》代表羅馬教會傳統，M（馬太）和Q代表耶路撒冷教會傳統，L（路加）代表該撒利亞教會傳統；此外，第四部福音書《約翰福音》亦不例外，代表以弗所教會傳統；參見劉光耀：《四福音書解讀》，第31-32頁。

<sup>⑤</sup> 正如福音派學者的觀點，福音書一方面是“神的話”，另一方面也帶有歷史印記和文學特性。整體觀之，聖經的歷史批判一開始雖是以革命姿態出現在聖經學研究領



評視角揭示曾經參與了福音書文本生成過程的某些意識形態因素。因為，或許更為妥當的看法是，意識形態在福音書生成過程中未必發揮決定性作用，卻勢必發揮作用。

與一般文學作品不同的是，福音書不但沒有在消費和再生產的過程中被解構或降格，恰恰相反，福音書被消費和再生產的過程對應的既有其獲取正典資格的正典化過程，也有其被傳抄、接受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着基督教的發展壯大，溝通了人言與聖言的障礙，使原本散亂無序的文獻匯集通過整理、修訂、翻譯、解釋等生產加工程序，成為一部權威的神聖經典。從文本生產的特定視角審視聖經，與其說是在對聖經進行去魅，不如說是在再現聖經“魅化”的過程。

## 二、手工複製時代的文本變動

紀元初期的羅馬帝國處於不斷擴張和加強政治控制的階段。眾所周知，猶太人和羅馬人對耶穌運動關注的重點其實大相徑庭。只要耶穌運動的影響範圍局限於精神信仰層面，擁有廣袤版圖的羅馬帝國就不會對這個彈丸之地的邊緣化教派產生任何興趣。如此一來，各方在遵守底綫的前提下一度維持着脆弱的默契。

在此背景下開展的耶穌運動無疑具有現世革新的指向，割裂“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的做法是對之最大的誤解。<sup>①</sup> 準確地說，耶穌運動從一開始就兼有屬靈和屬世兩種指向，只是隨着外部形勢的惡

---

域，受到傳統教會神學打壓，但時移世易，神學家們後來發現他們同樣可以利用歷史批判方法實現自身的神學意圖，便也轉而熱情地投身其中。這也從側面說明，意識形態性貫穿福音書生成始終，即使不是全部，也是關鍵性的。

<sup>①</sup> 趙敦華認為，奧古斯丁所說的“城”（*civitas*）“兼有社會和國家的意思，又等同於‘人民’”，其政治主張既是淨化和壯大上帝之城，又是地上的社會與國家間的和平有序。可參趙敦華：《上帝之城裏的哲學》，載《基督教文化學刊》第23輯，2010年春，第107頁。[ZHAO Dunhua, “Philosophy in *The City of Go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23(2010):107.]

化，組織者靈活調整了處世策略，<sup>①</sup>不僅在耶穌的神人二性問題上對自身教義體系進行了對話式的解釋，以塑造自身無害而有益的社會形象，還有意淡化和遮蔽早期耶穌運動的現世反抗屬性，以積極地向羅馬帝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靠攏，從而由一個猶太教內部的小教派成功轉型為帝國國教。<sup>②</sup>初期教會調整和適應自身策略的動態過程既是組織者為了適應外部環境有意為之的結果，又不得受制於客觀生產條件而呈現出某些具體特徵。從福音書文字的具體變化中可以對這一過程進行生動的說明。

概括來說，公元2到4世紀的早期基督教會對耶穌神性和人性的代表性觀點有：耶穌是人不是神的嗣子說；耶穌不是人是神的幻影說；耶穌是人又是神但神人二性分離的諾斯替主義，<sup>③</sup>以及大公教會正統派的基督論。由於紀元初期存在眾多的早期基督教著作，因此論辯雙方各自引經據典以壯聲勢，而在決定哪種引文更有說服力時存在兩個判斷標準：<sup>④</sup>第一個標準可稱為作者原則，即舊約作者必須是先知，福音書作者必須是直接或間接領受過耶穌教訓的人，可見“真實”反

---

<sup>①</sup> 王學晟運用框架整合的社會學理論，考察了耶穌運動後期從小教派到大教會的轉變，指出耶穌運動的策略調整既獲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也減少了與周圍社會環境的摩擦。參王學晟：《從小教派到大教會的轉變：耶穌運動的框架整合》，載《聖經文學研究》2017年春，第48-64頁。[WANG Xuesheng Nathanael, "From Sect to Church: The Frame Aligment of Jesus Movemen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14(2017): 48-64.]

<sup>②</sup> 杜蘭認為教會制與君主制的類似是基督教成為國教的重要原因，參見威爾·杜蘭：《凱撒與基督》，載《世界文明史》（第三卷），臺灣幼獅文化公司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487頁。[Will Durant, "Caesar and Christ," in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3, trans. Taiwan Lion Culture Company (Beijing: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487.]

<sup>③</sup> 此處的“諾斯替主義”主要指公元4世紀的聶斯托利主義一派，而諾斯替主義整體上對這個問題上並沒有達成統一觀點，有些持幻影說，有些持嗣子說。

<sup>④</sup> Leslie Howsam and Scott McLaren, "Producing the Tex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r Editions of the Bibl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s.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62.

映耶穌本意仍是論戰的最有力武器；第二個標準可稱為讀者原則，意味着那些擁有更多追隨者的基督教團體在論辯中佔據更大優勢。文本生產過程在這些不同神學派別的爭論中逐步進行，持守某種神學觀點的基督教團體為了贏得辯論，不惜改動福音書文本使之符合自身觀點。最終的結果是，公元449年羅馬主教利奧引入神聖位格（divine person）的概念，認為神性和人性在道成肉身的過程中結合於基督的位格之中，修正了基督二重本性論，奠定了古典基督論的基礎。<sup>①</sup>

若以時間順序來看同觀福音書，《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使用了最早成書的《馬可福音》的材料，而《馬可福音》成型之前，還存在着口傳時期的不同版本。不同文獻來源毫不奇怪地形成了多處文本症候。<sup>②</sup> 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sup>③</sup> 福音書本身的創作宗旨就既非耶穌生平傳記，更不是系統的文學作品，而是新興的（教派）組織有意識地揀選材料以通傳“福音”（意識形態）的宣言書。<sup>④</sup> 在明確這一前提後，我們來對上述神學論爭引起的經文變動進行具體考察。

嗣子說的主要代表是伊便尼派（Ebionite）。這是一個主要由猶太人基督徒組成的團體，他們仍然保留着猶太教尊奉耶和華獨一神的信

---

<sup>①</sup> 有學者提出，在最早期階段是否存在某種接近“正統”的思想？但這種觀點遭到反駁：《約翰二書》《約翰三書》成書時，“道成肉身”觀念已經在部分教會中得到確立。有關基督教派“正統”的觀念史研究可以參考Walter Bauer,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1; James D.N. Dun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Press), 1977。

<sup>②</sup> Larry W. Hurtado and Chris Keith,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s.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69.

<sup>③</sup> 尤其在伊格爾頓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看來，參見前文所引伊格爾頓：《耶穌基督：福音書導論》。

<sup>④</sup> 參見E. F.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131; C. I. Scofield, ed., *New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987.

條，認為耶穌不是神，只是上帝收養的“嗣子”，從而僅是一個真實的人。嗣子說的反對者強調耶穌的神性，以《馬可福音》第1章40至44節耶穌治癒癩瘋病人的故事為例，可以發現基督教正統出於反嗣子說引起的文本變動。

有一個長大癩瘋的來求耶穌，向他跪，說：“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耶穌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大癩瘋即時離開他，他就潔淨了。耶穌嚴嚴地囑咐他，就打發他走，對他說：“你要謹慎，什麼話都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又因為你潔淨了，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對眾人作證據。”（可1：40-44）

通過比較現有最古老的希臘文伯撒抄本（Codex Bezae）、《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該處文本，可以發現此處的“耶穌動了慈心（SPLANGNISTHEIS）”在伯撒抄本中竟然是耶穌“動了怒（ORGISTHEIS）”。<sup>①</sup>更加驚人的是，馬太和路加在幾乎逐字引用馬可這一節材料的情況下，竟不約而同地對耶穌SPLANGNISTHEIS還是ORGISTHEIS做了省略！

考察《馬可福音》的文脈結構與創作背景後，埃爾曼認為“憤怒的耶穌”應該是馬可寫作的原文，馬可筆下的耶穌是一個堅決維護屬靈權威的形象，而耶穌動怒的原因恰恰在於癩瘋病人在請求耶穌治療時措辭不當：“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耶穌既有意願更有能力使癩瘋病人潔淨，但這種試探性的口吻引起耶穌反感。但反嗣子說者認為原文的耶穌“動了怒”具有的人性色彩過濃，因此在抄寫這段經

---

<sup>①</sup> Leslie Howsam and Scott McLaren, *Producing the Tex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r Editions of the Bible*, 149.

文的時候將SPLANGNISTHEIS私自改成了ORGISTHEIS。<sup>①</sup>

幻影說的支持者中以馬吉安最為著名。這位哲學家教師是第一位有意識地進行聖經正典化的基督徒，有學者認為馬吉安正典加速了福音書正典化的進程。<sup>②</sup>馬吉安深受使徒保羅影響，認為保羅的真意在於區分律法和福音，而耶穌是不同於耶和華上帝的另一位神，具有完全的神性，耶穌的流血和死亡只是表面上的人性“幻影”而已。

幻影論否定耶穌人性的觀點遭到教父特爾圖良、愛任紐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耶穌的人性是完全的和不容質疑的。耶穌作為大衛王的後裔，且從童貞女體內孕出，以痛苦的流血和犧牲進行救贖，他的神性和人性是不能分割的，<sup>③</sup>如果他的人性是“幻影”，那麼基督拯救行為本身的偉大意義就會遭到削弱。因此，強調耶穌真實的人性非常重要，這一點以《路加福音》中耶穌設立聖餐的經文最為典型：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着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22:17-20）

在許多古代抄本中，不存在“為你們捨的……”這句話。<sup>①</sup>那麼如

---

<sup>①</sup> 詳參埃爾曼：《錯引耶穌：〈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第130-136頁，亦見於Justo L. González, *Essential Theological Terms*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137-139。

<sup>②</sup> K. G. Ku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Press, 1975), 487.

<sup>③</sup> Michael Slusser, “The Heart of Irenaeus's Theology in Scripture,” in *Irenaeus: Life, Scripture, Legacy*, eds. Paul Foster and Sara Parivi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2), 135-139.

何證明這是後來加進去的，用意又是什麼呢？“為你們捨的……”具有明確的行為意義，即申明了耶穌以血肉設聖餐的真實性。需要注意的是，路加筆下的耶穌血肉並非拯救的贖價，耶穌作為無罪之人受難的“行為”才是真正促使人們悔改的原因，只有人懺悔並轉向上帝，才能得到救贖。由此可見，反幻影論者強調耶穌完全人性的目的在於捍衛耶穌受難的行為意義，如果耶穌只有神性沒有人性，那麼他就沒有人的真實感受，從而耶穌作為無罪之人受難的行為也就失去了救贖的價值。正是出於這一目的，反幻影說者才在原文的基礎上增添“為你們捨的……”

分離說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是信守諾斯替主義的基督徒。他們承認耶穌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但認為耶穌的神性和人性之間是互相分離的，神性的基督只是暫時棲居在人性的耶穌體內，隨着耶穌死亡的臨近，神性就徹底離開了他。因此耶穌才會在臨死之前大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27:46）這句話被認為是福音書中令人頗為費解之處，諾斯替主義者從字面意義來解釋“離棄”的含義，認為這是神性離開耶穌身體的明證。<sup>②</sup>而在諾斯替文獻《腓力福音》中，在這句話之後還有一句：“〈上主〉在十字架上說了這些（話）。因為他〈是〉在那兒被分別出來。”（《腓力福音》72a）<sup>③</sup>由於“離棄”或“分別”的字眼極易被諾斯替主義者利用，有些抄本就將該詞改為“嘲笑”，試圖規避諾斯替式的解釋。然而，從目前流行的版本來看，反諾斯替主義者的改動似乎並不足夠成功，因為此段異文依然保持着上帝“離棄”耶穌的原貌。<sup>①</sup>這恰恰反映出一個神學上

<sup>①</sup> Bruce R. Metzger, *Manuscripts of the Greek Bible: An Introduction to Pal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2.

<sup>②</sup> David Brakke, *The Gnostics: Myth, Ritual, and Diversity in Early Christia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3.

<sup>③</sup> 黃根春編：《基督教典外文獻——新約篇》（第二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75頁。[*Christian Extra-Canonical Document – New Testament II*, ed. Eric K. C. Wong (Hongkong: Chinese Literature Council Ltd., 2001), 75.]

的難解之謎：耶穌的神性和人性之間到底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對這一問題的爭論也延續到了機械複製時代的文本生產之中。

### 三、機械複製時代的文本變動

機械複製時代福音書文本的生成特徵可以用16世紀第一本希臘文新約聖經出版的例子加以說明。伊拉斯謨是首位編輯出版希臘文新約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在新約的文本發展史上，伊拉斯謨的新約版本成為隨後三百多年風行西歐的希臘文標準版本，著名的英王詹姆士欽定版聖經就是以之作為翻譯底本的。

本雅明曾精確指出：“在文獻領域中造成巨大變化的是印刷，即對文字的機械複製”<sup>②</sup>，而出版和印刷在文本生產中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伊拉斯謨的新約出版於1515年，但實際上這並不是歷史上第一本印刷的希臘文新約。在此之前的1514年，西班牙樞機主教西麥內斯（Ximenez de Cisneros）就率先印刷了《康普魯頓合參本聖經》，然而由於多種條件限制，該版本直到1522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在《康普魯頓合參本聖經》印刷之後，伊拉斯謨及其出版商約翰·弗羅本為了贏得出版首部希臘文新約的殊榮，強行加快出版進度，在沒有充分搜集和參照最好抄本的情況下便匆匆開始了編輯工作，甚至直接從拉丁文回譯希臘文，以彌補希臘文《啟示錄》抄本的缺漏部分。<sup>③</sup>伊拉斯謨為了完成出版任務而倉促趕製的“急就章”之作自然有許多不足之處。<sup>④</sup>

<sup>①</sup> Brakke, *The Gnostics*, 191.

<sup>②</sup> 本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年，第5-6頁。[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rans. WANG Caiyong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1), 5-6.]

<sup>③</sup> Jacob van Bruggen, *The Ancient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Winnipeg, Man.: Premier, 1976), 53-54.]

<sup>④</sup> 例如上文提到的《馬可福音》第16章的最後12節原本是沒有的，卻由於伊拉斯謨選用的福音書抄本是12世紀的產物，竟然將這一結尾包含在內了。

除此之外，伊拉斯謨的新約版本還遺漏了一個重要的文本片段，即《約翰一書》第5章7至8節：“在天上作證的有三：父、道及聖靈，這三樣都歸於一。在地上作證的有三：就是聖靈、水及血，這三樣都歸於一。”這一段落對於教會來說極為重要，因為它是三位一體教義的直接依據。<sup>①</sup>但是，伊拉斯謨的新約版本中恰恰缺失了這一段落，原因在於其使用的抄本中關於此段的原文是：“作見證的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都歸於一。”<sup>②</sup>

伊拉斯謨“忠實”地按照該抄本出版了首版新約，但他的做法觸怒了教會，因為缺乏“父、道、聖靈”的直接經文證據，這對於基督教會的打擊無疑是致命的。戲劇性的情節出現了，面對各方的攻擊和壓力，伊拉斯謨同意在再版新約中加上該節經文，但前提是反對者必須拿出含有這節經文的希臘文抄本。果然，一份含有這節經文的古代抄本在16世紀出現了（確切地說是偽造出來了），各方終於各償所願，矛盾得以平息。

伊拉斯謨版新約聖經是人類社會開始進入機械複製時代的產物。15世紀，古騰堡發明印刷機，使得文本的生產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在此之前，文本的生產只能依靠抄寫人員一個字一個字地進行手工複製，不僅速度極慢，而且造價昂貴。隨着印刷技術的進步，高效的書籍生產和低廉的複製成本促使信息的主要傳播方式從口頭傳播變為書面傳播，專業的出版機構亦應運而生，分工不斷細化，主要表現就是印刷和出版流程的分離。<sup>③</sup>伊拉斯謨的“首版”希臘文新約出現上述問題發生在機械複製的時代，也正與這一文本生產機制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說明文本生產的意識形態變動不僅存在於手工複製時代，也

<sup>①</sup> Schniedewind,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53.

<sup>②</sup> P. C. Allen, *The Age of Erasmus*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3), 127.

<sup>③</sup> John Man, *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02), 19.



存在於機械複製的時代。<sup>①</sup> 雖然複製技術不同使得文本生產的具體結果不同，但都使意識形態對文本生產的干預凸顯出來。<sup>②</sup>

約翰書信的經文變動也寫照了早期基督教時期最大的一個神學論題：耶穌的神人二性及其相互關係。耶穌是人，還是神？若二者皆是，耶穌的神人二性以何種方式存於一體？筆者相信，討論神人二性的基督論之所以重要，原因恰恰在於這絕非一個單純的神學問題。或者，在那個時代神學與現實政治本就是不可分割的。<sup>③</sup> 進一步來說，如果這純粹是一個神學問題而無關意識形態，那麼其影響力最多發生在早期基督教與猶太人之間，根本不會引起羅馬當局的關注。基督教在羅馬帝國遭遇的戲劇性變化，正說明了這一發生在“神學”與政治之間的複雜糾葛。

那麼，大公教會的正統派是如何處理耶穌的神人二性問題呢？公元451年，查爾斯頓大公會議對基督的神人二性予以界定：耶穌“是唯一的基督，是子，是父，又是獨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淆且保持不變，不存在分裂和隔離。二性的聯結不會破壞二者之間各自擁有的特徵；神性和人性會合在一個位格之內，且各自特點得以保存”。<sup>④</sup> 基督的神性與人性在位格中建立彼此平等的對話關係，兩者既互動又合一，互動既不會模糊各位格的個體性，也沒有割裂位格間的關係，不僅在“彼此之中存有”，而且從對方中獲取自身的存在。這種位格式的平等關係既是對外部等級制的挑戰和反駁，又是協調教會矛盾達到平衡狀態的最佳解決方案。<sup>⑤</sup> 由此看來，基督教正統的勝出並非偶然，它與嗣子說、幻影說、分離說等異端論辯的真正目的，在於堅守

<sup>①</sup> Brian Elliott, *Benjamin for Architects* (London: Routledge, 2011), 158.]

<sup>②</sup> Schniedewind,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65.

<sup>③</sup> Richard A. Horsley, *Sociology and the Jesus Move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94), 8.

<sup>④</sup>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rev.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78), 340.

<sup>⑤</sup> Colin J. D. Greene, *Christology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Marking Out the Horiz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2004), 135-137.

一種對話式的理想神人關係。因此，耶穌的神人二性（需要）彼此平等且不可化約、不可轉化，更不可缺失其一。

綜上，如果將文本生產理解為一種意義生成的機制，可以發現福音書文本的動態演變是文本意義不斷生成和增殖的過程。<sup>①</sup>因而對於立足未穩的早期教會系統來說，調和或消解經文內部的矛盾使之符合所謂“正統”，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從時間上來看，這一合理化經文的過程從現存最早的基督教作品《帖撒羅尼迦前書》（約公元49年）出現，至17世紀機械印刷技術和國家機器的共同推動使得經文形態真正穩定下來，其間包括了正典化過程和傳抄過程，持續大約1600年。筆者通過對手工複製時代和機械複製時代福音書文本生產機制的分析，結合社會歷史語境和具體文本變動，提煉出一條貫穿福音書文本生產的重要綫索——神聖性和世俗性的對話存在是文本生產過程中意識形態因素滲入的結果，<sup>②</sup>意在助益於對富含多重意蘊的福音書文本進行適切理解。

---

<sup>①</sup> 據不完全統計，僅《新約》中的異文數量就達三、四十萬之巨，比《新約》本身的字數還多。參見埃爾曼：《錯引耶穌：〈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第80-81頁。埃爾曼同時也提到這些異文大部分都是無關緊要的。經文的不確定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督教派的“多樣性”，反過來基督教派的多樣性又加劇了更多文本的出現，教會歷史學家馬丁·馬蒂（Martin Marty）曾感嘆道：“我們所見的基督教有多種形式，差不多包括25000個教派，而這些教派大多在中途便瀕臨分裂，於是我們就有了50000個實體。”基督教的多樣性已經成為學術共識，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信仰與本土文化結合的必然結果，它體現了基督教傳統的豐富程度，表達了多樣性與同一性的結合，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基督教的多樣性是長期衝突、磨合、調試的代價，其間不乏“正統之爭”的激烈角逐。見Martin Marty, “Cross-Multicultures in the Crossfire: the Humanities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in the Crossfire*, eds. David A. Hoekem and Bobby Fong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5。引自楊慧林：《西方馬克思主義宗教問題論說的六個問題領域》，第13頁。

<sup>②</sup> 馬克思主義希伯來聖經批評學者哥特瓦爾德直截了當地指出：“聖經文本蘊含意識形態，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見Norman K. Gottwald, *The Tribes of Yahweh: A Sociology of 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rael, 1250-1050 B. C. E.* (New York: Orbis, 1979), 47。

## 結語

耶穌基督形象的這種對話特質是通過福音書文本的生產而逐步形成的。無論是神性還是人性，都只是意識形態生產過程的結果。楊慧林教授犀利地指出：“如果去追尋正典形成的歷史，我們分明會感到幾乎每一種闡釋都與樹立或反抗一定的權威相關聯。”<sup>①</sup> 神人二性在福音書文本中的對話式存在是不同意識形態進行文本生產的結果。不過，事實上從近現代社會的主流認知來講，耶穌或者說福音書文本的天國指向與塵世指向之間很顯然不是平等對話關係。對耶穌基督的認知首先得是神，其次才（可能）是真實的人。這種現代認知的形成實際上是闡釋行為造成的結果，其目的在於消解耶穌人性中的政治意味，以符合羅馬帝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而要達到此目的，強化耶穌的神性而淡化其人性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

<sup>①</sup> 楊慧林：《基督教的底色與文化延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頁。[YANG Huilin, *Ji du jiao de wen hua di se yu yan shen*(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24.]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llen, P. C. *The Age of Erasmus*.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3.
- Bauer, Walter.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1.
- Belo, Fernando. *A Materialist Reading of the Gospel of Mark*. Translated by Matthew J. O'Connell. Maryknoll: Orbis, 1981.
- Benjamin, Walter. *Reflections: Essays Apb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Edited by Peter Demetz. New York: Harcourt Jovanovich, 1986.
- Brakke, David. *The Gnostics: Myth, Ritual, and Diversity in Early Christia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ruce, F. F. *Israel and the Nations*.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 Bruggen, Jacob van. *The Ancient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Winnipeg, Man.: Premier, 1976.
- Dunn, James D. 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Press, 1977.
- \_\_\_\_\_. *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A New Testam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880.
- Eagleton, Terry.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erso, 1991.
- Ehrman, Bart D. *Lost Christianities: Battles for Scripture and the Faiths We Never Kn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Elliott, Brian. *Benjamin for Architects*. London: Routledge, 2011.
- González, Justo L. *Essential Theological Terms*.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 Gottwald, Norman K. *The Tribes of Yahweh: A Sociology of 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rael, 1250-1050 B. C. E.* New York: Orbis, 1979.
- Greene, Colin J. D. *Christology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Marking Out the Horiz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2004.
- Harrison, E. F.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 Hills, Edward F. *The King James Version Defended*. The Christian Research Press, 1984.
- Horsley, Richard A., and Jonathan A. Draper. *Whoever Hears You Hears Me: Prophets, Performance, and Tradition in Q*.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9.
- \_\_\_\_\_. *Sociology and the Jesus Move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94.
- Howsam, Leslie, and Scott McLaren. "Producing the Tex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r Editions of the Bibl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ited by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Hurtado, Larry W., and Chris Keith.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ited by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63-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Kelly, J. N. D.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78.
- Macherey, Pierre.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Man, John. *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02.
- Marty, Martin. "Cross-Multicultures in the Crossfire: the Humanities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in the Crossfire*. Edited by David A. Hoekem and Bobby Fong, 15-27.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Mekenzie, Steven L. and Stephen R. Haynes, eds. *To Each its Own Meaning*.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
- Metzger, Bruce M. *Manuscripts of the Greek Bible: An Introduction to Pal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_\_\_\_\_.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y, 1994.
- Pippin, Tina. "Ideology,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Bible." *Currents in Research*, no. 4 (1996): 51-78.
- Reed, Walter L. *Dialogues of the Wor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Bakh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chniedewind, William M.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ited by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cofield, C. I., ed. *New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lusser, Michael. "The Heart of Irenaeus's Theology in Scripture." In *Irenaeus: Life, Scripture, Legacy*. Edited by Paul Foster and Sara Parivi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2.
- Tenney, M. C. *New Testament Times*.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續）》，李迅譯，載《當代電影》，1987年4期，第31-43頁。[Althusser, Louis.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late by LI Xun. *Contemporary Cinema*, no. 4(1987): 31-43.]
- 阿爾都塞：《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Althusser, Louis. *Du zi ben lun* (Lire Le Capital). Translate by LI Qiqing and FENG Wengua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
- 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Althusser, Louis.

- Bao wei Ma ke si* (Pour Marx). Translate by GU Liang. Beijing: The Commerical Press, 2016.]
- 本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1年。[Benjamin, Walter.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ranslate by WANG Caiyong.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1.]
- 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論戲劇》，丁揚忠等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Brecht, Bertolt. *Bu lai xi te lun xi ju* (Brecht on Theatre). Translate by DING Yangzhong.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1990.]
- 陳潤棠：《新約背景》，香港：聖道出版社，1974年。[CHEN Runtang. *Xin yue bei jing*. Hongkong: Shengdao Publisher, 1974.]
- 威爾·杜蘭：《凱撒與基督》，載《世界文明史》第3卷，臺灣幼獅文化公司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Durant, Will. “Caesar and Christ.” In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3. Translate by Taiwan Lion Culture Company. Beijing: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1999.]
- 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Eagleton, Terry.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e by WEN Ba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 伊格爾頓：《馬歇雷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戴侃譯，載《國外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第33-39頁。[Eagleton, Terry. “Macherey an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e by DAI Kan. *Social Sciences Abroad*, no.1(1983):33-39.]
- 伊格爾頓：《耶穌基督：福音書導論》，趙文瓊譯，載《基督教文化學刊》2010年春，第49-77頁。[Eagleton, Terry. “Introduction to Jesus Christ: The Gospels.” Translate by ZHAO Wenqio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23(2010):49-77.]
- 巴特·埃爾曼：《錯引耶穌：〈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黃恩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Ehrman, Bart D. *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Translate by HUANG Enl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 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Engels, Friedrich.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5.]
- 林鴻信：《第一位使徒：抹大拉的瑪利亞》，載《聖經文學研究》第2輯·2008年，第217-247頁。[LIN Hong-Hsin. “The First Apostle: Mary Magdalen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2(2008): 217-247.]
- 劉光耀：《四福音書解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LIU Guangyao. *Si fu yin shu jie du* (Introduction to Gospels).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04.]

- 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下卷），白錫堃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Lukács, Georg. *Guan yu she hui cun zai de ben ti lun*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vol. 2. Translate by BAI Xikun.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1993.]
- 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Marcuse, Herbert. *The Dimension of Aesthetic*. Translate by LI Xiaob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Marx, Karl.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Marx, Karl. “The German Ideology.”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7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Marx, Karl. “In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x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麥茲格：《新約正典的起源、發展和意義》，劉平、曹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Metzger, B. M.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Translate by LIU Ping and CAO Jing.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8.]
- 莫爾特曼：《三一與上帝國：論上帝的教義》，周偉馳譯，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Moltmann, Jurge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Translate by ZHOU Weichi. Hongkong: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7.]
- 王學晨：《從小教派到大教會的轉變：耶穌運動的框架整合》，載《聖經文學研究》2017年春，第48-64頁。[WANG Xuesheng Nathanael. “From Sect to Church: The Frame Aligenment of Jesus Movemen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14(2017):48-64.]
- 黃根春：《天國概念的演變：從耶穌到保羅》，載《聖經文學研究》2010年，第200-216頁。[Wong, Eric K. C. “Tian guo gai de yan bian: cong ye su dao bao luo.”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4(2010):200-216.]
- 黃根春編：《基督教典外文獻——新約篇》第2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年。[Wong, Eric K. C., ed. *Christian Extra-Canonical Document—New Testament II*. Hongkong: Chinese Literature Council Ltd., 2001.]
- 許志偉：《基督教神學思想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XU Zhiwei. *Ji du jiao shen xue si xiang dao lu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1.]
- 楊慧林：《西方馬克思主義宗教論說的六個問題領域》，載《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第11-16頁。[YANG Huilin. “Six Problems in the Religious Discourse of Western Marxism.” *The Religious Cultures of the World*, no. 1(2012): 11-16.]

- 楊慧林：《基督教的底色與文化延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YANG Huilin. *Ji du jiao de di se yu wen hua yan shen*.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趙敦華：《上帝之城裏的哲學》，載《基督教文化學刊》2010年春，第100-107頁。[ZHAO Dunhua. "Philosophy in *The City of Go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23(2010):100-107.]
- 張一兵：《問題式、症候閱讀與意識形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ZHANG Yibing. *Wen ti shi, zheng hou yue du yu yi shi xing ta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 2003.]
- 齊澤克：《圖繪意識形態》，方傑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Žižek, Slavoj. *Map Ideology*. Translate by FANG Ji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